

# 探索亚洲文学阐释系统的新向度

## ——以王和达《亚洲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为鉴

袁 喆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然经过亚洲文学系统的诠释,因而探索以中国视角为向度的亚洲文学阐释系统能够完善世界文学研究体系。《亚洲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是由东欧学者王和达等人集体编撰、分析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各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著作。借鉴该著作的文学研究系统,能够以文学意识形态功能为框架,即审美意识形态引导的社会意识反映系统,关涉社会生产、生活与制度运行发展的文学阐释机制;以唯物史观的民族发展史为内容,即结合共时和历时的双重结构视野,书写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互动关系的历史;以中外文学互动发展为宗旨,即以变异学的理论方法构筑世界文学交流影响的动态阐释系统。最终,探索一条以中国为起点,以世界文学为终点的、由内向外的文学研究路径。

**关键词:**亚洲文学;中国文学;变异学;唯物史观;王和达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3)01-0080-06

**收稿日期:**2022-08-18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1批面上资助项目“捷克《新东方》杂志的中国文学阐释系统研究”(2022M712284)阶段性成果;2022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捷克《新东方》杂志的巴蜀文学阐释与传播研究”(SC22C046)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博士后专题研发基金项目“捷克文学中的中国主题故事研究”(20827041E41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喆(1991-),女,吉林白城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专职博士后,讲师。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3.01.004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级结构要素,亚洲文学这个区域文学概念并未在国内学界获得较多关注。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认为:“以亚洲为舞台,思考亚洲的未来,这种文学就是亚洲文学。我认为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国的作家,应该把自己的文学思考联系到亚洲。我提出亚洲文学这个概念,目的是呼吁人们重视这个问题。亚洲各国应该携起手来,一同思考亚洲。文学也是这样,应该思考亚洲的文学。”<sup>①</sup>亚洲文学不仅需要作家的关注,也需要文学研究者的阐释。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必然要经过亚洲文学系统的诠释,探索以中国视角为向度的亚洲文学阐释系统能够完善世界文学研究体系。由汉学家王和达等东欧学者编纂的《亚洲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较全面地分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各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书中包括亚洲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研究以及中国、印

度、孟加拉国、伊朗、尼泊尔等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受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影响,作者建构了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亚洲文学研究系统,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史观剖析亚洲现代文学发展的普遍特征,运用客观科学的论述方法分析其全貌及内部发展的动因。参照东欧学者的文学阐释模式,可以探索中国学者亚洲文学研究的新向度。

### 一、文学意识形态的阐释系统

在亚洲现代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大众写作与日常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而文学批评也是比较特别的大众书写存在。“它的这种处境决定了它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就是集中于文学生产的哲学美学基

<sup>①</sup> 莫言:《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艺术评论》,2020年第6期。

础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sup>①</sup>这也就是说,文学被视为社会存在的现象,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能够形成严明的等级制度,并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而“现代亚洲文学的发展时期明显以组织(意识形态)功能为特征,这种阶级功能上的转变甚至几近取代社会意识形态生活的其他渠道”<sup>②</sup>。文学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反映社会意识的发展,它是交流的系统,并存在于多项元素的变化之中,社会意识的转变是导致文学系统发生改变的因素之一。在东欧学者看来,亚洲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剧变中,那么在建立文学分析系统时就需要将社会意识作为重要对象进行考量。

东欧学者将社会整体的运行发展视为意识形态变化的系统,文学自身内置的文学意识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组成元素。当文学回到审美意识本体,就不再被简单归结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成为涵盖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意识构成体系。文学创作者通过客观的科学视角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意识进行再现,其中涉及社会道德意识、民族意识的统一性、各社会阶层团体意识的差异性和文化艺术在传统和当下的地位与价值。童庆炳认为:“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sup>③</sup>可见,文学作为反映社会意识的文字系统不总是政治手段。如果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各种社会集团形成的社会意识,而剥离其政治功能的一面,文学作为不同社会集团经过长期特定文化社会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书写就能够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王和达等人认为,亚洲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社会意识的根本性转变是亚洲现代文学产生的基础。其中包括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道德认同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这导致社会精英集团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并成为亚洲文学转变的诱因。实际上,在亚洲文学产生之初、欧洲文学进入亚洲之前,社会意识本就进入了革新阶段。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在此过程中也急剧变化。

宗教和道德信仰代表着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东欧学者将亚洲文学视为不同意识形态集团的结合体,这当中包括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印度和伊斯兰体系,也包括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日本体系。印度和伊斯兰等近东国家的社会组成形式是宗教引导的精英阶层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而中国作为远东国家,则是儒教和道教主导的社会道德

约束系统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反映,自然也体现出多种宗教背景影响下的意识形态特色。王和达认为:“传统的接受能力和对非自治价值观的可及性以及折中主义的倾向可能是促进和加速开放欧洲影响力的万能钥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相反,封闭的本国系统或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使中国的发展过程更加困难和缓慢。”<sup>④</sup>在他看来,宗教系统构建的社会意识结构更容易接受现代性以及现代文学的新思想,这是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现代文学迅速发生发展的前提。但日本快速的现代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此结论存在例外。实际上,“亚洲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即使在受到欧洲实际影响之前,亚洲社会的传统观念也已成为人们质疑和进行改革的目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观念逐渐退回社会发展的深层当中。新价值观念的发展,将个人从旧的伦理和美学依赖中解放出来,并用旧的社会关系网代替对国家的新归属感,这反过来又产生了热情高涨的爱国主义”<sup>⑤</sup>。这些社会意识的传统都在欧洲文化进入亚洲后被打破。

观察欧洲社会价值对东亚的影响是东欧学者研究亚洲文学的切入点,他们认为亚洲现代文学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社会意识的变化。社会意识实际上决定于意识形态系统的组成。如果说文学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那么所有亚洲传统社会的文学都被固定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在欧洲文学影响亚洲之前,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世俗性的一部分。在那之后,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视为文学本身最重要的存在形式,这不只是一种社会功能的呈现,同时也是

- ① O.Král - V. Kubičková, M. Novák - D. Zbavítel Z. Černá - B. Krebsocvá - K. Petráček,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s in Asia. Volume II. Prague: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68, 40.
- ② O.Král - V. Kubičková, M. Novák - D. Zbavítel Z. Černá - B. Krebsocvá - K. Petráček,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s in Asia. Volume I. Prague: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68, 11.
- ③ 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 ④ O.Král - V. Kubičková, M. Novák - D. Zbavítel Z. Černá - B. Krebsocvá - K. Petráček,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s in Asia. Volume II. Prague: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68, 24.
- ⑤ O.Král - V. Kubičková, M. Novák - D. Zbavítel Z. Černá - B. Krebsocvá - K. Petráček,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s in Asia. Volume II. Prague: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68, 27.

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特征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文学生产是特定社会集团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因此文学就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欧洲文学的意识形态就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进入亚洲,这部分被现代亚洲文学意识系统吸收的欧洲文学意识,通常是亚洲各国文学系统中不存在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从前存在但没有形成明确概念的文学观念。这表现在对文学形式的影响上,如欧洲戏剧和历史短篇小说在印度产生影响,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则在中国和日本产生影响。此时欧洲文学意识彻底融入亚洲本土各国文学的土壤中,并根据各国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

文学反映论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基础,这或多或少忽略了文学本质论更广泛的内涵。但是,从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角度却可以建立独特的亚洲文学研究系统。显然,东欧学者对此已有所探索,他们将文学意识与宗教意识放在同一层级进行比较。此时文学并非政治意识的附庸,而是社会意识变化的组成要素。这样,通过研究文学意识在不同社会意识群体中扮演的角色,就可以梳理亚洲文学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处于儒家社会意识的中、日、韩三国自然被归为亚洲文学的子系统,而伊斯兰教主导的阿拉伯国家,则成为阿拉伯文化的子系统成员。亚洲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在欧洲文学的冲击下完成的,这已是中外学者的共识。那么,欧洲文学与亚洲文学同属世界文学下的子系统,其对亚洲各国文学的影响具有同质性,但也因亚洲各国文学子系统中多样的文学意识而产生差异。因此,欧洲文学意识在经过扭曲和变形后才得以进入亚洲文学意识体系。例如,东欧学者在著作中谈到中、日文学都吸收了欧洲文学的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因素,而加拿大汉学学者布鲁斯则进一步指出自然主义在两国文学中的差异性:“中国的自然主义与日本截然不同。在日本,‘个人小说’通常以第一人称书写,被视为自然主义的精髓。在中国语境中,自然主义小说本质上不应该用第一人称,而应该用客观全知的叙述者风格来写;它不应该通过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多重角色来描绘个人,而是描绘整个社会。因此,在中国语境中,日本所谓的‘自然主义’将被称为‘浪漫主义’。”<sup>①</sup>由此看来,欧洲文学意识影响亚洲各国文学意识呈现异质特征,这与亚洲各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息息相关。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可以反映出亚洲各国的社会现实,那么,通过对社会意识特征的综合分析,可以衡量文学意识

在社会意识发生巨变后产生的社会功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提出并非为了消除文学与政治功能之间的联系,政治需要的存在会促使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政治功能合二为一。这是分析中国革命文学的理论基础,也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学于亚洲文学之重要性的根据。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牵连可以追溯到革命文学时期,即文学与政治功能紧密相关的时代。中国学者刘伟认为:“战后,日本知识界陷入思想混乱和迷茫之中,开始在战败的分界点上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于是当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传入日本后,便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将其纳入战后思想进程中,寄托着改造日本社会、改造日本文学的美好愿望。”<sup>②</sup>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意识进入日本战后的社会意识中,对其文学思潮产生了影响。泰国学者徐佩玲也有相似论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伴随着泰国‘文艺为人生’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是与适应政治、社会的需求相辅相成的。”<sup>③</sup>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意识是促使其向海外流动的必要因素。那么,对于建立中国本土的亚洲文学研究系统而言,建构文学意识形态的阐释系统有助于形成一套完整的分析系统。王和达等人将西方文学意识对亚洲文学的影响视为自变量,立足于欧洲文学中心主义,将亚洲文学意识的变化视为因变量,也就是最终结果。

对照这样的研究系统,中国学者可从接受者的视野分析欧洲文学意识对本国传统文学的冲击及由此产生的文学动荡。如果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衍生品,那么研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意识变化则能透视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这不仅需要学者着眼于中国本土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应参照中国社会意识与亚洲整体社会意识之间的变动关系。以中国文学意识为中心,建立以文学意识形态功能为框架,即审美意识形态引导的社会意识反映系统,关涉社会生产、生活与制度运行发展的文学阐释机制,向外辐射亚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文学研究系统。

① JOSHUA S. MOSTOW, KIRK A DENTON, BRUCE FULTON, SHARALYN ORBAUGH,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5.

② 刘伟:《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问题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③ 徐佩玲(Pairin Srisinthon):《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国之影响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8页。

## 二、唯物史观下的亚洲文学史构建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是从物质生活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将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各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历史的基础。如果要建立以文学意识形态功能的意义系统为根基的亚洲文学研究系统,就需要以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审视社会意识形态的发生发展。东欧学者以客观科学的态度体察文学的发展史,认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对宗教、哲学、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意识形态的反映。王和达等人的亚洲文学研究产生于微观与宏观历史相结合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文学由作家个人的书写史进入国家层面的社会发展史,进而形成民族发展史的宏观图景,这其中有作家在宏观历史潮流中个人的命运选择,也有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剧变后民族发展史在文学中的直观映像。

东欧学者将亚洲文学视作科学的系统,从亚洲各国总体发展趋势中勾勒出文学发展的共性。一方面,欧洲经济政治的影响导致亚洲各国社会思想意识发生根本转变,伴随着欧洲现代工业技术的输入,亚洲各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欧洲文化也通过吸纳留学生到欧洲、办欧洲语言报刊等方式影响亚洲。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欧洲艺术文化思想的冲击体现在传统文学结构的转换、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新文学创作结构的建立上。知识分子将欧洲思想和意识形态植入各国文学,借此彰显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亚洲各国根据现实需求从西方价值体系中寻找适当的方法论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以上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社会因素被看作比较亚洲各国文学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在文学发展史上曾对多国文学发展轨迹产生影响,因此成为其发展的同质性因素。例如,英国势力最初通过经济渗透进入亚洲各国社会,后又转向政治领域,因而欧洲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中国和孟加拉国文学的影响有着极高的相似性,这是因为两国都有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宏观的历史发展走向往往反映在微观的个人生活中,亚洲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将个人自由从传统社会束缚解放的趋势,这表现为社会道德价值的世俗化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的觉醒。伴随着这种思潮的出现,作家也从传统职业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例如教师、记者、医生等。同时,他们开始对个人传记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文学打破了本土的哲学基础和美学基础,开始吸收现代美学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在此期间,文学创作和传播被附加了意识形态的目的,传统的文学结构、主题以

及意识形态发生改变,文学迎来了大众化的趋势。

综合宏观的社会因素和微观的个人实践现实,王和达等人认为,亚洲新文学打破传统美学观的哲学基础并引入现代美学价值,文学传统题材被颠覆并加入现代题材元素,本土语言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文学的诗歌形式也发生简化,一种新的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诞生。新的美学功能和情节结构开始出现,社会和历史小说的大面积传播成为文学的新现象。因此,亚洲文学美学思想的主要原则也在新旧时期的交替中发生了转变。各国的文学审美思想和艺术创作实践符合其对应的社会特点,它们受到传统社会规范体系的约束,这些封闭、自治的系统限定了它们自身意义上的艺术生产。这并不是亚洲文学的特有表现,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在西方思潮进入亚洲各国以前,本土文学萌生了对传统经典机械应用的厌恶情绪和对新生事物的渴望,它尝试打破原有的文学生产系统,中断其连续性,但并非彻底推翻文学传统。此时,亚洲文学在传统与革新中踟躇,文学革命一触即发。

东欧学者设立以历时变化为准轴的文学发展流变体系,将亚洲文学放入坐标图当中,横向坐标代表共时的平行对比研究,纵向坐标代表历时的文学发展变化。他们认为中国文学的革新与社会历史的演变密切相关,在欧洲政治经济影响侵入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本土的文化传统及当权政府并未对此产生激烈反应。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是1890年左右,经过大约六十年的进程,中国经历了文学语言的变革以及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交锋,最后形成现代文学的总体条件。1890年以后,当中国国内政治危机到达顶峰后,西方的文化系统才正式对中国产生影响。王和达等学者将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35年—1860年左右,此时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初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文化意识产生较强的冲突。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变缓慢。第二个阶段是1860年—1898年左右。第三个阶段则是1898年改良派失败之后。西方政治经济的影响引起国内思想的动荡和危机,对传统社会系统造成冲击。在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民族危机之后,中国迅速开始利用西方思想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现象被东欧学者归因于中国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然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个人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的脚步,也就导致中国现代文化观念在亚洲国家中形成较晚。但进入第二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化速度就开始加快,且明显快于第一个阶段,并且到

第三个阶段已经和日本齐平。

此外,东欧学者通过研究亚洲民族解放史来考察文学发展的外动力,比较各国反抗侵略斗争影响下民族文学发展的曲折性。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孟加拉国、伊朗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相似,即随着欧洲思想文化在本国通过新闻手段的输入,本土文学产生了反抗。知识分子随即选择一些符合当下现实需求的西方价值引入当时社会体系。这种现象在四个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并延续了五年,新文学也在此过程中发展。然而,新文学作品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中国晚于日本二十年。日本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而革命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中国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导致新文学的出现延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布拉格汉学家观点一致的还有中国学者朱栋霖,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于1917年之前的二十年,文学发生的内驱力在于人的发现,五四时期对人个性的发现促使新文学产生个人主义的倾向。<sup>①</sup>东欧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主要以西方思想的介入为准轴,本质上是研究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传播影响史。在此基础上,他们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之前社会总体的历史发展趋势,并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与亚洲各国进行横向对比研究。这种方法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应看到,东欧学者从外部观察亚洲文学,将亚洲文学视为与欧洲文学相对的整体,却忽视了整体内部各国文学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内部视角研究亚洲文学,能够深入剖析亚洲文学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这正是中国本土研究的优势所在。

以上分析可见,东欧学者以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探查中国现代化发生前夕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挫折史,并从本土的内部发展诉求和西方思想冲击的外部刺激的双重视角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史。那么,建立本土亚洲文学研究系统,需要研究者打开视野,将中国文学视为亚洲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个体到亚洲总体的宏观发展史研究,对比亚洲各国文学发展的同质特性,突出其在亚洲文学发展史中的核心地位。另外,以中国发展史为主线,以接受者主体为准轴,建立亚洲文学系统中的中国文学研究系统,关涉到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突出地位,便可建立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亚洲文学阐释系统。

### 三、文学动态系统的变异学诠释模式

《亚洲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是布拉格汉学研

究的集大成著作。捷克汉学的现代文学研究开始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之后的二十年(1937年)左右,这种即时性研究的积极之处在于能够及时呈现当时文学发展的状态,置身历史发展的步履中,消极之处则在于其研究成果具有特定的时代局限性。而中国本土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民国时期还只是学者和文学家们个人兴趣的产物,总体上未形成学术研究的态势。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研究开始从文学史走向文学文本分析,这与布拉格汉学的研究活动相距近半个世纪之久。由此看来,国内现代文学研究是一种事后研究,其总体优势在于能够对现代文学进行全局的历史评价。而汉学研究则具有间距性,“‘间距’主张拉开对话两者之间的距离,尊重双方的独立性,采取的是不带偏见的超然立场”<sup>②</sup>,容易把握文学文本的全局,本国学者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但能够对文本进行母语文化背景的细读。那么,在围绕建立亚洲文学阐释系统的问题上,东欧学者和中国学者具有视野上的差异。

在方法论上,二者采用的理论体系不同。布拉格汉学受到捷克比较文学家杜里申观点的影响,他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在比较文学中的范围、内容和各种表现形式特征的领域,文学间性以及文学间进程问题没有文学性问题研究得透彻。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其隐含的过程特征,即民族或国家框架内的一系列相关文学事实预设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变化”<sup>③</sup>。比较文学导向的布拉格汉学坚持从文学间性与文学间进程的视角分析亚洲现代文学史,以文学间性理论讨论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交际关系。它不观照单一民族文学的纯文学特点或组成方式,而是必须将文学放入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语境中,这是文学间性理论的先进性所在。东欧学者考察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学间性问题,认为亚洲现代文学表现出同质性特征,其细微的差异之处和各国历史的发展节奏息息相关。欧洲文学是亚洲文学本土历史发展的外来介入因素,其进入亚洲产生的交流变异并没有被强调。因此,利用变异学理论阐释可在此问题上有所建树,比较文学变异学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传

① 参见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曹顺庆:《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75页。

③ Marián Gálik, Interliterariness as a Concep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00, xx.

## 总 结

播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的交流现象,既有空间上的转换,也有时间上的流动。通过研究其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特征,可以建立更高层次的亚洲文学分析系统,即欧亚文学的交流系统。其横向坐标在于欧洲文学进入亚洲各国文学之后产生的变异特性,纵向坐标在于文学交流变异的演进发展。这是以欧洲文学为主视角的亚洲文学动态发展系统。反之,亚洲文学作为被干预者的变异发展,以及欧亚文学交流中的反向传播则可建立以亚洲文学为主视角的研究系统。其横向坐标为亚洲各国接收欧洲文学后产生的变异,其纵向坐标则为亚洲各国文学发展变异特征的演变形式。

也就是说,参照王和达等学者的研究体系,可以利用比较文学变异学建立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亚洲文学分析系统。中国学者与东欧学者研究视角的分野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变异,东欧汉学家考察中国文学是从世界文学—亚洲文学—中国文学的方向上定位的,而中国学者则正相反,即采取中国文学—亚洲文学—世界文学的观察顺序。由于立场和视线方向的差异,文学研究自然会产生变异并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这恰恰是树立中国文学亚洲地位的互补性方式。布拉格汉学研究的视野焦点是从外向内的转换过程,而中国学者的研究焦点则是从内向外的过程。要凸显中国文学在亚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地位,应建立主、客观系统的双向评价体系,二者互为补充,才能更全面地阐释亚洲文学的发展进程。

总的看来,王和达等人的亚洲文学分析系统建立在文学他国化的基础之上,汉学家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运用本国的话语阐述模式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的国际化传播。但此类文学传播仍存在过滤、误读的现象,这就需要中国学者以“我者”为视角探索亚洲文学阐释系统的新向度。从“我者”的视野出发,打破国别文学研究的视野壁垒,体察洲际文学进而观照世界文学的向度,有利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新的评价标准。

“亚洲文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而是以地理划分的文学场域,它是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中转站,也是世界文学语境回归中国文学视野的必经之路。王和达等东欧学者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从普遍的历史情况、社会意识的内容、文学的社会功能三个角度阐述亚洲现代文学产生的内在机制,运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阐述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通过分析本土文学传统以及欧洲文学影响阐明亚洲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最后结合形式主义理论阐述文学的内部结构变化,包括文学基本的美学思想,文学的题材、形式、叙事模式以及文学语言的转变等。他们以外部观察者的立场建立了以“他者”为中心的亚洲文学研究系统。“他者视角”和“我者视角”是互补的双向流动性视角。从“他者”到“我者”过滤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从“我者”到“他者”则是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但也应注意主体视野的单一性和孤立性。在欧美汉学研究的领域,作为“他者”的汉学家们透过世界文学的学术概念进入区域化的亚洲文学视域,再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因而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别文学的地位并无二致。那么,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文学研究系统的意义在于,从欧美汉学研究的反向视角即“我者视角”体察中国文学之于亚洲文学的重要性,强调亚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核心地位。这样,就能彰显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主体性意义。但这并非意味着要建立中国中心主义的亚洲文学研究系统,而是形成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文学研究传统、在文明互鉴基础上构建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它与欧洲文学体系并存并自然交互流动,最后形成不断向前推进发展的世界文学研究系统。总之,参照东欧汉学家的文学阐释系统,可以形成以文学意识形态功能为阐释机制,以唯物史观的民族发展史为内容,中外文学互动发展的动态文学发展系统,从而建立了亚洲文学阐释系统的新向度,即以中国为起点,以世界文学为终点的、由内向外的文学研究路径。

(责任编辑 张先飞)

### **Further Discussion on “Malicious buyer”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Li Shuo

Whether punitive damages are applicable to the behavior of “Buy Fake Product on Purpose” or not, is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recent years. In food safety related cases,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food safety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food and drug” should be applied. The “buyer” term in Article 3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food and drug” endows the subject status to the people who “Buy Fake Product on Purpose” in punitive compensation lawsuit.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knowing well” and can’t take damage as a constituent element. Those who “Buy Fake Product on Purpose” not only have one side of gaining profits through lawsuit, but also have another side of supervising food safety and promoting public welfare. This paper is not in favor of completely abolishing and suppressing the “one size fits all” policy. Under the correctly designed system and legal regulation, those who “Buy Fake Product on Purpose” can protect the right and supervise the food mark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so as to achieve a benign system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social co-governance.

### **Personal Dimension and Social Dimension of Privacy Confirmation**

Li Yanshun

At present, the “self-determination” and “control” theories seem to dominate privacy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al privacy, and reflected in legal documents.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 to individuals does not imply the subjectivity of privacy in any way.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privacy, we can find that the approach to privacy is individualistic, an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end point of the research are all individual, but the privacy standards, the judgment of citizens’ privacy expectations, and the conflicts and the reconcile between the right of privacy and the other fundamental rights, all reflect the views of communitarianism. After all, privacy is a matter of “degree” judgment, It is not “all” or “all nothing”. Privacy wants to be the object of privacy law, need to get social recognition, and make exquisite arrangements among multiple values to anticipate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Yu Hua’s New Novel Wencheng**

Gao Yu

Combining the avant-garde nature of Yu Hua’s short stories in the 1980s and the tradition of “returning” realism in the novels in the 1990s, Yu Hua’s novel Wencheng, therefore, not only has the avant-garde exploration in artistic forms, but also reflects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as realist novels which endows it with readability. The content of Wencheng includes both “the reality of life” and “the reality of literature”, which means its “reality” is a mixture of “hypocrisy” and “reality”. Compared with Yu Hua’s other novels, the “coexistence” of times and history,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fiction and reality in this novel is more natural. The novel tells three stories which are unified internally and split extrinsically, while the split has achieved some unity at a higher level, that is, on the whole of Yu Hua’s creation. It means the pioneer Yu Hua and the “returning” Yu Hua have achieved unity in this novel. Wencheng inherits the consistent style and expertise of Yu Hua’s novels in terms of writing bloodiness, violence, death, etc., in terms of the poetic nature of language, and in terms of writing character’s dialogue, 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big changes and new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 theme, structure, subject matter, character image, etc.

### **Exploring the New Dimens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Asian Literature—Taking Old ? ich Král’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s in Asia as a Mirror**

Yuan Zhe

When Chinese literature moves to world literature, it must go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Asian literature system.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Asian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can improve the world literature research system.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s in Asia is a work compiled by the Eastern European scholars Old ? ich Král and others, which analyze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Asi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By analyzing the literary research system that draws on this work, it is possible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ideology, that is, a reflection system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guided by aesthetic ideology, a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related to social production, life, and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The content is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is,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from the dual structural vision of 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sm;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s to construct a dynamic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world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heoretical method of variation. Finally, exploring a literary research path starting from China and ending with world literature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 **Haruo Sato’s Buddhist Cognition Under the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Restoration**

Sun Tianqi

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Aestheticism, Haruo Sat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Showa period, Japan was in turbulent years, searching for salvation and a way ou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m became the theme of Haruo Sato’s literature. In the meanwhile, his buddhist cognition is based on the adoration of Honen, the founder of Japanese Pure Land Buddhism, and the traditional restorati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 in this period should be “Kikusuitan; ? Honen Shonin Betsuden”, which was serialized in Tokyo Daily News. While advocating Honen’s thought, it alludes to the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Showa period with the turbulence of the end of the Heian period. The national attribute and traditional value of Honen’s thought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Haruo Sato to look back on the classics and emphasize the